

黄金周的“账本”不能只算钱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黄金周”在国内已经有18年的历史,出游人数从最初的不足3000万增长到现在的近6亿人次。时移势易,从制度上做相应的改革已经是事不宜迟,否则看似火爆的旅游业也许会发生突然的垮塌,国人急切盼望下一个黄金周不再是“花钱买罪受”的感觉。

日前,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国庆假日旅游市场情况报告。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全国共接待游客5.93亿人次,同比增长12.8%,累计旅游收入4822亿元,同比增长14.4%。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这个账本看上去很美。不过,很多为此成绩做出贡献的游客却有不同的感受。景区、机场、车站和道路的拥堵,让他们的假期休闲大打折扣。急剧增长的旅游产业和滞后的休假制度已经出现严重“不适”,旅游部门在面对喜报时更应该看到背后的这个问题。

虽然很多地方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景区客流提前做了预警,但是游客依然汹涌而至,但凡有点名气的景区都呈现爆满的局面。摩肩接踵的旅游让很多人感叹,不来遗憾,来了更遗憾。因为

不愁客源,景区宰客、导游欺客等问题更是屡禁不绝。这种畸形发展的旅游产业,偏离了造福民生的宗旨,就很难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黄金周”人满为患的问题由来已久,只是近几年让人逐渐有了忍无可忍的感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公安、旅游、交通部门都使出了大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假期中依然是“半个中国在路上”。要有效解决假期拥堵问题,无非两条途径,一个是降低出游人数,另一个是增加假期天数。根据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游客回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能走得通的道路也只有不断增加国民的休闲度假时间,把“黄金周”的客流分流到其他假期中。

对国人来说,以前长假的主题是“回家”,而现在更多的是游

玩。度假观念出现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城乡家庭结构有了巨大改变,更是因为经济发展壮大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一个很显著标志就是注重精神需求的消费,他们不满足于吃喝之乐,更在乎游玩之趣。虽然目前究竟有多少人属于中产阶级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这个阶层会迅速膨胀,因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可以预见,即使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持续下去,旅游产业仍有快速增长的巨大空间。

旅游业逐渐成为经济的“领头羊”,游客还是不断地被“薅羊毛”,再借口市场不成熟已经很难平抑众怨,再呼吁游客“错峰出游”也是空谈,毕竟真正适合旅游的“黄金周”只有一个,不调整现有休假制度谈“错峰休假”就是空谈。劳动法明确规定“国

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但是除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基本能落实,在多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根本没法严格执行。很多劳动者权衡利弊之后,也不愿意和用人单位在带薪休假上较真。在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同时,更为有效的途径只能是科学调整法定假日,以全国统一的步骤迫使企业保障劳动者的休闲度假时间,以更多的“黄金周”分流国庆“黄金周”客流。

“黄金周”在国内已经有18年的历史,出游人数从最初的不足3000万增长到现在的近6亿人次。时移势易,从制度上做相应的改革已经是事不宜迟,否则看似火爆的旅游业也许会发生突然的垮塌。国人急切盼望下一个黄金周不再是“花钱买罪受”的感觉。

国企重组需谨防“后遗症”

大家谈

刘瑞明

尽管企业间的合并现实是一件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宝钢武钢合并方案的出台还是引发了各界的巨大争议。相当一部分业界人士对合并后的“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表示看好,认为“重组将避免恶性竞争,提高市场竞争力”,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表示了对于企业合并可能带来的问题的担忧。国庆节假期前的这场国企合并,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间的合并是基于双方自愿的自发行为,合并者和被合并者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二者都认为合并后能够给自身带来更多的市场份额、更多的利润等收益才会选择合并。但是,国有企业的合并却往往掺杂了许多其他因素。宝钢武钢合并,此前传言已久,但是两个企业高层曾在多个场合予以否认,而最终形成合并,恐怕离不开主管部门的“撮合”。在所有的国有企业改制

方案中,重组合并这一方案常常被政府所青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在理论上,国有企业之间的重组合并可能会发挥“规模效应”,在迅速扩大企业规模的基础上降低成本。第二,国有企业之间的重组合并只是发生在国有企业内部,可以规避掉其他改制方式所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第三,重组合并中的一方往往是处于绩效较差的情形,需要政府的救助,通过合并可以使得政府摆脱直接救助的责任,将之转嫁给绩效较好的合并方。第四,当多个企业被合并为一个企业时,国有企业能够被更好地当做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例如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宝武合并”是基于去产能的考虑。正是基于上述好处,主管部门往往出于政府意志,采用“拉郎配”的方式对企业进行重组合并,甚至“无中生有”。然而,从改革历史来看,这种重组合并行为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后遗症”,需要防范和规避。

第一,国有企业重组合并引发的内部控制权之争和利益之争。尽管国有企业名义上

是属于全国人民所有的,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层层委托代理引发的监管难题使得国有企业往往会沦为内部控制,而国有企业内部典型的等级产权分配制度使得其领导人更像是“准官员”而非企业家,控制权的不同暗含着由此而来的工资、薪酬、在职消费等一系列控制权收益的不同。在合并的过程中,难免就会有内部的控制权之争,一旦处理不好反而有可能使得合并后企业的“内生交易成本”上升,绩效不升反降。

第二,国有企业重组合并的“后遗症”还表现在企业内部的拖累现象。当一类国有企业发展比较差而另一类国有企业发展得相对比较好的时候,政府为了摆脱直接的救助责任,往往希望通过重组合并来实现高效率国企对于低效率国企的“帮扶”,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重组合并方就对于被合并方负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效率的企业本来可以不断扩展业务的资金现在需要用来救助低效率的“兄弟”,形成企业内部的“软预算约束”和救助体系,合并后原

本运行良好的国有企业往往被那些运行较差的国有企业不断拖累,最后使得整个企业绩效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甚至下滑。

第三,重组合并以后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后遗症就是垄断势力的问题。一方面,合并后企业有了更强的定价权和市场主导权,一旦经济周期趋势变化,这很有可能形成强力的垄断定价,造成另一种垄断危害。另一方面,由于重组合并带有浓厚的政府意志,国有企业在承担了“战略性负担”之后,企业绩效一旦表现不良,则借口更为充足,届时因为“一企独大”,与政府谈判的砝码更足,“软预算约束”可能更为强烈。

如果重组合并能够按照理想愿景逐步实现,固然利国利民。但是,在重组合并的过程中,也需要充分遵照市场规律,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解决好企业合并后可能带来的后遗症,真正促进企业绩效的不断提升,助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作者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公民论坛

别因优惠金额小就把用假证不当回事

付彪

十一期间,不少游客为旅游省钱打起了小算盘:从网上买个假学生证,可以享受景点的学生优惠价。伪造的学生证做工精细,照片上有清晰的钢印,甚至还能查到学籍信息和课表。(10月8日人民网)

景区门票动辄上百元,网购假学生证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这让不少游客动起了歪心思,诱惑他们“重返学生时代”。事实上,许多景区对证件查验并不严格,游客往往可以“蒙混过关”,有的即使有怀疑,但因找不出瑕疵还是卖了学生票,甚至表示“我先卖给你,检票能不能进我就不清楚了”。还有的明明查出是假证,连没收的权力都没有,更无权施加其它惩罚。这对买假证的游客来说,只要能进一个景区就是“赚”,景区门票学生优惠价的“诱惑”,以及相对应的惩罚机制的微不足道,“买个假学生证旅游”,便自然成了不少游客的“明智”选择。

不能不说,很多人忽视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总以为伪造、贩卖假证是违法,应当受到法律处罚,而购买、使用假证的行为微不足道,换来的好处也不过几十元钱,“情有可原”或可免除法律处罚。殊不知,伪造、贩卖与购买、使用假证都是违法行为,都要受到相应处罚。根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对于此类行政违法行为可以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其中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因此,要消除“买个假学生证旅游”的诱惑驱动,对于有关部门来说,一方面要严厉打击伪造、贩卖假证者,堵住假证滋生的源头;另一方面不妨考虑开发相关软件,建立全国联网的证件检索系统,提高证件鉴别能力。同时,对于游客来说,还是坚持做人本分、光明正大购票旅游为好,毕竟手持假证企图“蒙混过关”总让人担惊受怕。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旦被执法部门查获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因小失大?

房产税并非抑制楼市泡沫必杀技

媒体视点

随着楼市的每一轮暴涨,在限购、限价、限贷等行政调控效力不彰之后,有关房产税抑制泡沫的论调均会随后传出。

房产税并非是抑制楼市泡沫的必杀技。从已试点房产税的上海和重庆两地来说,事实证明房产税对上海楼市暴涨的抑制效果是失败的,房产税试点6年来,上海平均房价依然翻了一倍(年均增速约为16%)而重庆房价虽然6年来年均增速仅为6%-7%,但归根到底却并非是房产税之功,而是极其宽松的供给制度,在过去10年间,重庆年均土地成交高达70平方公里,而上

海市却不足前者的十分之一。房产税仅是税制改革的一个截面,其是否应该推出,究竟应该怎样推出,理论上应与土地出让金等现行房地产税费动态平衡,而不宜持续沉迷于行政调控的惯性思维,过度期待房产税对房价的调节作用。比如,日本早于1950年就开征房产税,但其楼市依然迎来了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的持续大幅暴涨,随后也迎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可避免的泡沫破裂,而在这一暴涨暴跌的轮回之间,房产税所谓的抑制和调节功效可以说近似于无。

过于期待房产税对房价的调节作用,其本质上与限购、限价、限贷一样,依然是一

种行政性调控思维在作祟。而对于构建一个健康良性的楼市而言,任何行政性的调控其作用均只可能是短暂的,只有遵循市场化逻辑的调控,作用才有可能长期的。

其实,讨论如何抑制楼市泡沫,我们并不需要过多的长篇大论,而只需要回归于经济学供需平衡的常识。在过去十多年,我国一、二线大城市房价之所以“屡调屡涨”,其根源在于人口流入与土地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人口流入增幅远远大于土地供给增幅),而一、二线大城市人口持续大规模流入的核心动因,又在于其对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的相对垄断。

故而,在当前楼市调控貌

似又一次进入攻坚期之下,我们有必要抛弃既往的行政性主导思维,更不能将房产税想象成抑制楼市泡沫的必杀技,而应该运用经济学的常识,正视并有效化解上述结构性失衡的现实。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完善人口流入与土地供给的动态调节,也就是说人口流入过多,土地供给亦有必要相对增加,另一方面则应优化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的区域性合理配置,只要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医疗等资源进一步到位,大城市的房价泡沫必然可以得到适度消减。(摘自《新京报》)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